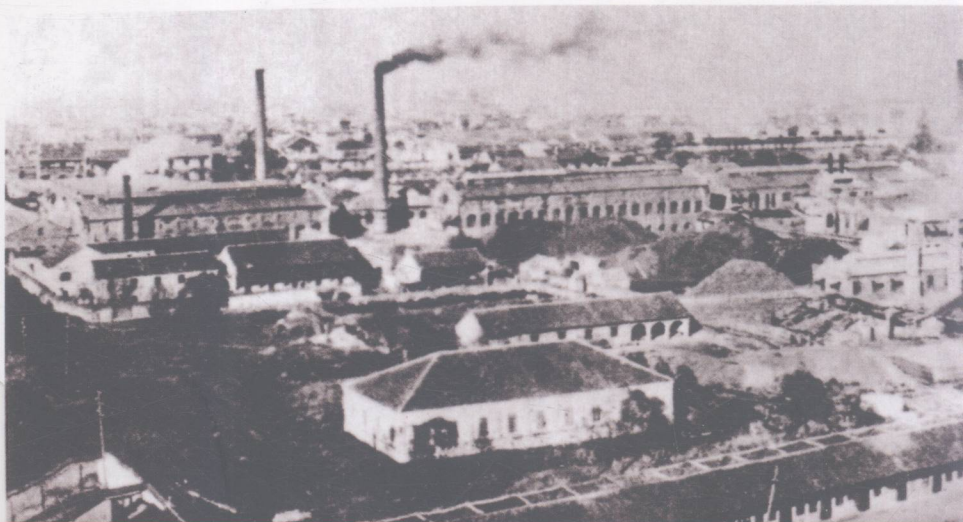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经济与社会

Xinhai Geming Qianhou De Hubei Jingji Yu Shehui

宋亚平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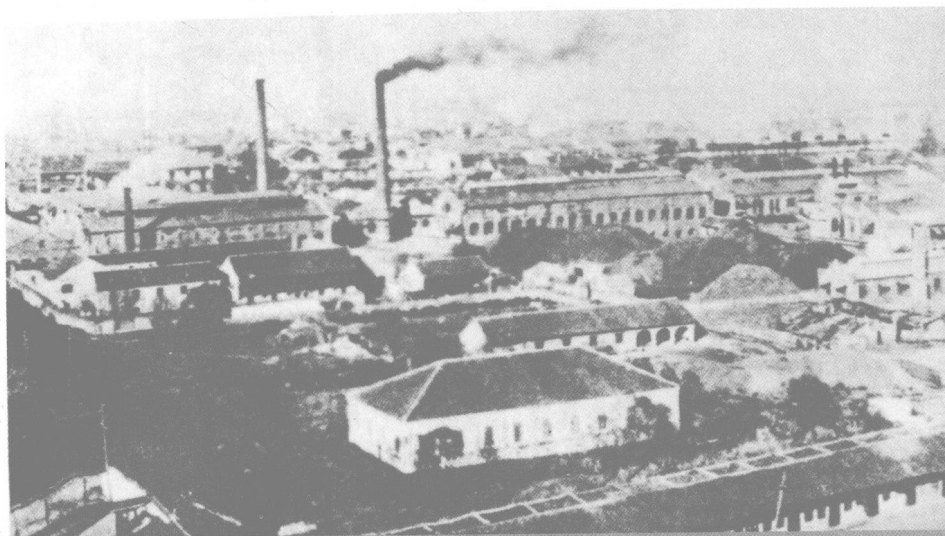
K286.3
20/22

阅 览

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经济与社会

Xinhai Geming Qianhao De Hubei Jingji Yu Shehui

宋亚平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经济与社会 / 湖北社会科学院
文史所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04 - 9969 - 5

I. ①辛… II. ①湖… III. ①辛亥革命 - 关系 -
经济发展 - 湖北省②辛亥革命 - 关系 - 社会发展 -
湖北省 IV. ①K257②F127.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329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兰馨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

插 页 2

字 数 535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章开沅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湖北省、武汉市正在积极筹备各项纪念活动。

湖北武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革命舞台，也是中外交往和冲突的重要地区之一。自1861年汉口开埠后，随着武汉三镇从传统市镇向近代都会转变，其后又有宜昌、沙市相继开埠，湖北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剧变的时代。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并在湖北主政长达18年之久。作为洋务运动后期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有感于内乱外患压力，积极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竭尽心力，致力于湖北洋务新政建设，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行宪政，决计速行，多有建树。对于近代湖北社会发展和经济振兴，产生深刻影响，奠定了湖北近代工业的基础和基本格局。伴随着湖北新式工业发展，机器生产日渐被引入湖北传统社会之中，并成为引起其他经济部门与整个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从而揭开了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一页。经历了晚清末年大规模的洋务建设，湖北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为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发展实业，振兴中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年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虽最终被袁世凯窃取，然而，这场推翻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政体的大革命，毕竟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跃进，传统经济和传统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不能不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民国初年，湖北武汉经济经历了从破坏到恢复的艰难，逐渐走出困境。伴随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规相继颁布，工业管理机构陆续建立和完善，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情持续高涨，从而为欧战期间湖北工业的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加之湖北具有轮轨相交、交通便利、原料丰富、市场广阔等有利投资环境，因而不只刺激了省内各界竞相投资工业，同时也吸引着沿海厂商和外商纷纷来鄂投资建厂。在振兴实业之声浪弥漫全国的影响下，湖北民间资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转投工矿业，推动湖北近代工业特别是民营工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作为首义之地，伴随经济社会环境重大变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也随之发生变化。

回顾辛亥革命前后，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湖北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奠定了工业化早期初步发展的基础，并在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氛围中越来越获得认同。通过与传统经济的“衔接”，以纺织、面粉业为代表的民营工业在民国初期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湖北近代工业的主体。旧中国湖北武汉在国内的工商经济地位，莫不来源于此。

由于资料散失等种种原因，以往对于辛亥革命前后湖北经济与社会变化的研究，大多比较分散，且主要偏重于武汉；与上海、江浙、四川等地的地方史研究相比，对于湖北地方史研究的深度也略显不够，尚有不少空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利用接触市县资料较多的有利条件，在辛亥革命百年庆典之际推出此书，不失为一种尝试和补救。视线下移，重视基层，应当成为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路径。期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11年4月30日

前 言

俗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记得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我还曾亲耳聆听过辛亥革命老人给我们讲述当年起义官兵如何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湖广总督瑞澂又怎样躲入“楚豫号”兵轮逃跑的战斗故事。如今回眸一望，“武昌首义”已经悄然百年。

这场于辛亥年间爆发的革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意义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它不仅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的黑暗统治，更是结束了长达 2000 多年陈旧反动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虽然一路坎坷曲折，但中国毕竟汇入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从此走向了新纪元。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辛亥革命并非少数精英分子头脑发热的主观结果或统治者因麻痹大意而偶然发生的事故。如同大地震和大海啸的性质一样，此前如果没有一个能量不断聚集和机会逐渐成熟的历史客观条件，纵使孙中山等人有天大的本领，也是绝对不可能让一个执政长达 260 年的王朝在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的。因此，辛亥革命必定是一个“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自然过程。

在长期以来学界流行的各种原因分析和经验总结中，人们最具认同感的说法，即武汉之所以能够成为“首义”之区，全凭张之洞督鄂以来通过“新政”运动的大力推行，促进了武备、实业、财政、金融、交通等新型生产力要素的蓬勃兴起，从而导致鄂省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必然脱离传统轨道而奔向崭新彼岸。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城头上的那声枪响，仅仅属于迟早都会划破夜空的信号。曾为张之洞弟子并时任湖北省学务公所实业科长的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一书中所宣扬的“种豆得瓜”论，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此后鄂人言及辛亥革命，大多为“种豆得瓜”论的翻版。

可以讲，研究辛亥革命前后湖北经济与社会的变化，自民国以来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老课题了。但是，我们过去大多都是把注意力或着重点放在湖

北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同辛亥革命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探讨上,总认为前者决定了后者。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两者之间并非简单地是一个谁决定谁、谁衍生谁的逻辑关系,而是内在地表现为一种既为“因”也为“果”的相互联系。其次,辛亥革命的熊熊大火虽然是从武汉首先燎原的,但绝不像春节拜年那样任由武汉乃至湖北地区革命党人“心想事成”的,恐怕得把武汉和湖北放在当时的中国这一宏观大格局中去具体考察。

实际上,辛亥革命的“孕育”期不能只从1889年张之洞督鄂算起,革命亦不仅仅是湖北省这一区域性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力量的逐步浸透,中国传统的政治局势渐进演变、阶级阶层不断分化、社会结构不断变迁、内外矛盾相互交织这一历史背景压迫下,由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例如,倘若没有19世纪中叶汉口的开埠,没有西方新式生产要素的移植推广和市场经济思想观念的传播流行,湖北仍将会在小农经济社会的旋涡里苦苦地挣扎;再如,假使不是晚清朝廷主导的一定程度上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张之洞“湖北新政”的横空出世和武汉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在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理想而英勇斗争,而这些斗争所凝聚成的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对湖北的革命党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影响。就像一场好戏的华丽演出,无论“正派”人物与“反派”人物,均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这种社会合力的巨大作用,才真正成就了1911年的武昌首义。

所以,我们作为当年志士们的后裔,在对辛亥革命能够首义于荆楚大地而倍感自豪的同时,千万不能重蹈“王婆卖瓜”的覆辙,理所当然地觉得湖北经济社会的近代化便果真就是缔造辛亥革命的唯一功臣。实事求是地讲,湖北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变化,只不过是近代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或一面镜子而已。尽管湖北地区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些可以称之为“开风气、拔头筹”的东西,但其余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则表现为一种受时代潮流的压迫而被动地随波逐流的状态。

在咸丰十一年(1861)汉口开埠之前,湖北省因处于内陆腹地,鸦片战争带来的资本主义“欧风美雨”梯度浸透的速度很慢、力度尚小,损害也就不大。从社会经济形态上看,似乎仍然还属于几千年来一成未变的小农经济社会。上层建筑方面,湖北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运动机制也基本上处于一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境界。但这一时期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湖北的

多次扫荡，对传统的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打击极为沉重，从而使得社会结构的混乱、官府权力的衰弱、地方士绅的雄起、纲纪人心的涣散等颓废现象日趋普遍化。尽管自胡林翼以来的总督巡抚们老在喊“中兴”，但直到清末也没有真正地“中兴”过。

汉口开埠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随着租界的设立、海关的控制、洋行的兴办，轮船公司与一系列机器工厂的开业，各式洋货倾销网络的渐次形成，洋教与殖民性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拓展，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湖北地区得以长驱直入和迅猛发展。虽然此时“西风”尚未压倒“东风”，但这种输入型的生产方式及其本地化的进程，显然已经紊乱了小农经济社会的阵脚，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基本上定局。此时，市场经济意识也开始动摇民众心目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孔孟之道不再是人们唯一的精神家园。同时，这一时期商业贸易活动空前的繁荣发达，带动了汉口、沙市、襄樊、宜昌等中心城市的升级换代和许多县域城镇建设的发展壮大。这种局面为后来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崛起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出了犹如土壤改造和环境整治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1861年汉口开埠前后是传统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两大力量此消彼长的潜伏期，貌似平静，实乃暴风骤雨之前夜的话，那么，从1889年张之洞总督湖北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则是近代湖北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显山露水的、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湖北地区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贡献力量并产生出了重大推动作用的辉煌时期。

与晚清能臣张之洞相比，人们多认为1889年之前的历任湖广总督均为碌碌无为之辈。其实，有些领导人之所以碌碌无为，不一定就是其本人胆略小、能力差、水平低的原因，而很可能是他想干事和能成事的历史阶段性条件不成熟的缘故。林则徐也曾经当过湖广总督，胆略、能力、水平恐怕不在张之洞之下，却始终没有兴办过一家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张之洞之所以能够甩开胳膊推行“湖北新政”，除开自己的能力水平之外，与朝廷当时刻意抑制李鸿章、袁世凯等北方派系而特别支持他在湖北“开创局面”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所需的科学技术、设备制造、管理人才、市场建设与服务体系等客观条件也渐渐跟上来了。这些重要的历史性的发展机会与“以卓识才干闻于天下”的张之洞不期而遇，“湖北新政”才得以浮出水面。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湖北新政”实际上也是晚清王朝推行的改革开放在湖北地区的具体体现。在总督衙门可谓是千辛万苦的操持之下，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湖北

布纱丝麻四局、大冶铁矿等大型官办工矿企业相继兴建投产，以机器轮船为手段的近代交通、以电报电话为内容的近代通信也初步形成。与此同时，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民间力量投资兴办工商实业的行动蔚然成风。省内的许多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单纯的商贸发展到工商业并重。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汉铁路通车，武汉已成为中国内地最大和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湖北则一跃成为清王朝后期洋务运动的重点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进步的综合竞争实力在国内仅次于上海而位居全国第二。这些物质层面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直接为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张之洞督鄂所大张旗鼓推行的“湖北新政”，以他“忠君”的本性，意在“守旧”而非真要维新。这种处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原则、生怕引发革命后果的改革举措，只能让新的生产力要素在夹缝中艰难地成长。同时，湖北近代工业的发轫，并不是民间资本或者社会力量的产物，而是政府强力主导甚至就是张之洞亲手操办的结果。这种“官办”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加之急功近利，使之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弊端。由此引发了两个后遗症：一是湖北的资本主义自幼发育不全，长期“缺乏营养”；二是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官本位”的遗传基因，一直病痛缠身。所以，湖北的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始终未能完成一次破茧而出的华丽蜕变，而是明显缺乏后劲，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在这一阶段中，与物质文明同步前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人文思想的转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渐次深入，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节节败退，旧有的社会结构的动摇与失衡已经无法避免；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在体制转型的混乱秩序中重新“洗牌”的结果，便是一批批封建地主阶级与封建官僚阶层“破落户”的出现与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新式知识分子等新阶级、新阶层的应运而生。从湖北的实际看，封建地主阶级与封建官僚阶层“破落户”与民族资产阶级往往具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他们大多都是晚清王朝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因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希望通过渐进的、温和的改良途径以努力寻找符合本阶级或本阶层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体制与社会管理方式，不大愿意在体制的控制力之外发生一场让大家同归于尽、玉石俱焚的革命运动。这就是湖北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之所以具有妥协性与摇摆性的根本症结。

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结构包括政治体制的调整，又必然诱发出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的变化。这一时期里，伴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新式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使得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从“以农为本”和“耕读守家”到近代重商拜金之风日重;从“三纲五常”的尊卑有序到满汉平等、官民平等、男女平等观念的流行;从“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被动思维到“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主动思维,无不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信仰的危机和传统伦理的衰败。各种社会新思潮的蓬勃兴起与广泛传播。所有这一切,又为辛亥革命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与重要的舆论环境。

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很快爆发。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旷日持久地刀兵对峙,几乎无暇顾及远东地区,从而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减压与喘息的机会。1913—1923年,汉口、沙市、宜昌三口岸的进出口净值平均额为2.2亿海关两。1925年达到3.5亿两,为1910年的2.3倍。湖北省财政税收由此年均增长10%。同时,在全国都在兴办实业的热潮推动下,湖北的近代工业特别是民间资本主义投资举办的轻工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因此,有人认为民国初期应该是近代湖北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昌盛的经济发展期,而这一发展格局的形成,亦与辛亥革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伟大作用有直接关系。

但是,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各海关口岸的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就是湖北省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更与辛亥革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而大多都是中西部地区和国外市场经湖北转口贸易的产物。这种转口贸易既带来了汉口、沙市、宜昌等城市建设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融会,也制造出城乡社会的两极分化,开启了“二元化”的严重冲突。从整个湖北的发展态势看,这一时期不断加速的商贸活动推动着城市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孤军深入,而广大山乡农村却几乎仍然处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境况下。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市场经济的某些法则所逐步割裂,城市日益发达而乡村日益落后,从而无法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协调局面。这恐怕就是很多人之所以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次城市革命的理由,也算是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后来的岁月里之所以一直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

从宏观角度讲,1911年以暴力形式登上前台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新的生产力本应该在一个全新生产关系的框架下乘势而起、突飞猛进。但是,这场拖泥带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建立起来的新兴政权没有旗帜鲜明地保护好资本主义的利益,更没有大刀阔斧地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开辟好道路,而且很快地先是被黎元洪窃取,后被北洋军阀霸占,政治上进入了长达16年的军阀混战时期。湖北地区在清末20年间艰难

形成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超常规发展的局面，以汉口保卫战的隆隆炮声和滚滚硝烟为开端，迅速沦陷于长期的停滞与萎缩之中。“湖北新政”所开启的近代化辉煌期也随之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到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马列主义的传入，历史才真正地翻开了新的一页，而湖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

宋亚平

2011 年 3 月

目 录

一 政务篇

第一章 张之洞与晚清湖北行政改革	(3)
第一节 清末湖北的行政机构改革	(3)
第二节 整理财政	(11)
第三节 司法改良	(15)
第四节 湖北咨议局	(18)
第二章 民国初年的湖北政务	(23)
第一节 从咨议局到鄂军都督府	(23)
第二节 从临时议会到省议会	(30)
第三章 民国初年的湖北财政与司法行政	(41)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湖北财政	(41)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司法行政	(46)

二 工业篇

第一章 晚清末年的湖北工业	(57)
第一节 湖北近代工矿业兴办的	(57)
第二节 晚清末年的湖北民族工业	(62)
第二章 辛亥革命与湖北近代工业	(69)
第一节 湖北军政府对工矿业的保护和恢复措施	(69)
第二节 倡办工矿 实业救国	(72)
第三节 各种实业救国团体相继建立	(76)
第四节 日趋萎缩的湖北官办工业	(78)

第三章 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民营工业长足发展	(82)
第一节 棉纺染织业	(83)
第二节 粮油加工业	(93)
第三节 日用制品业	(97)
第四节 农产加工业	(99)
第四章 民国初年湖北钢铁工业的发展	(103)
第一节 汉冶萍公司的“黄金时代”	(103)
第二节 大冶铁厂的兴建	(108)
第三节 汉冶萍公司的生产经营	(112)
第四节 湖北地方钢铁工业的发展	(115)

三 商贸篇

第一章 晚清末年湖北新式商业的发展	(121)
第一节 汉宜沙传统商业的变化	(121)
第二节 晚清末年的湖北商帮组织	(127)
第三节 晚清湖北金融机构的演变	(135)
第四节 新式商人组织的发展	(137)
第二章 辛亥革命与湖北商业贸易	(140)
第一节 湖北军政府的保商措施	(140)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湖北商业	(142)
第三节 民国初年的商业税收	(146)
第三章 民国初年湖北的对外贸易及商情调查	(150)
第一节 直接对外贸易	(150)
第二节 间接贸易的发展	(153)
第三节 重要出口贸易	(155)
第四节 湖北全省商情调查	(156)
第四章 民国初年湖北的商业市场与商人组织	(167)
第一节 汉宜沙商业市场的活跃	(167)
第二节 全省商会组织的发展	(171)
第五章 民国初年湖北的大宗贸易	(175)
第一节 棉纱贸易	(175)
第二节 匹头贸易	(178)

第三节 茶叶贸易	(181)
第四节 桐油贸易	(186)
第五节 木材贸易	(187)
第六节 杂货贸易	(189)
第七节 五金贸易	(190)
第八节 五倍子贸易	(193)
第九节 砂糖贸易	(195)

四 市政卫生篇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市政	(199)
第一节 汉口华界市政	(199)
第二节 省城武昌及其他县市的市政建设	(207)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后湖北的卫生管理	(212)
第一节 清末武汉的卫生管理	(212)
第二节 民国早期的汉口卫生管理	(218)
第三节 清末民初其他县市的卫生变迁	(220)
第四节 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市政卫生的比较研究	(222)

五 农林水利篇

第一章 张之洞与清末湖北农林水利	(233)
第一节 引进陆地棉种 兴办蚕桑事宜	(233)
第二节 发展农业教育 传播近代农学思想	(238)
第三节 晚清末年湖北的水利与水政	(245)
第二章 民国初年的农林改良	(254)
第一节 民国初年湖北振兴农业的措施	(254)
第二节 农林水利事业的兴办与发展	(258)
第三节 辛亥革命后湖北农村的土地关系	(263)
第三章 民国初年湖北农业的恢复发展	(269)
第一节 世界大战对湖北农业的影响	(269)
第二节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	(271)
第三节 食品类农作物输出的增长	(273)

第四节 农村手工业的恢复发展	(275)
----------------------	-------

六 军事篇

第一章 湖北近代武装力量的建立	(281)
第一节 裁汰旧营, 编练新军	(281)
第二节 创办近代军事学堂, 着力培养军事干部	(284)
第二章 辛亥革命后的湖北军事	(289)
第一节 黎元洪大举裁军	(289)
第二节 武昌、沙市、南湖驻军暴动	(292)
第三节 北洋军再次入鄂, 镇压湖北反袁斗争	(293)
第四节 武昌南湖马队暴动	(297)
第五节 湖北“荆襄自主”	(299)

七 思想文化篇

第一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	(307)
第一节 进步报刊的相继创办	(307)
第二节 清末湖北宪政改良思想的传播	(314)
第二章 封建专制思想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交锋	(318)
第一节 封建专制思想的反扑	(318)
第二节 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	(320)
第三节 湖北早期新文化运动	(324)

八 教育学术篇

第一章 清末湖北近代教育由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	(333)
第一节 清末湖北教育行政官衙与职掌	(333)
第二节 清末湖北新式教育的发展	(336)
第三节 驻防旗学的办学特点	(342)
第四节 清末湖北的留学教育	(344)
第五节 清末湖北的学术名人及学术成果	(346)

第二章 民国初年湖北教育体制的革新	(350)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教育行政改革	(350)
第二节 湖北教育界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	(355)
第三章 民国初年湖北现代教育体制的初步确立	(359)
第一节 各级各类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359)
第二节 湖北现代教育宗旨、学制及科目的确立	(364)
第三节 教会教育的拓展	(367)
第四节 民国初年的学术事业及首义史学	(370)

九 民族宗教篇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荆州八旗驻防社会	(377)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荆州旗城社区	(377)
第二节 辛亥革命后社区消亡与旗人社会变化	(391)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鄂西土家族地区	(396)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鄂西土家族社会	(396)
第二节 辛亥革命在土家族地区	(404)
第三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宗教	(413)
第一节 湖北近代宗教概况	(413)
第二节 近代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在湖北的传播	(421)
第三节 近代湖北教案及其原因	(424)

十 社会生活篇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湖北社会生活的变迁	(431)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湖北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背景	(431)
第二节 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引起湖北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	(437)
第二章 社会生活方式变迁推动思想观念的更新	(445)
第一节 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及影响	(445)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后湖北社会生活变迁的特点	(451)
主要参考文献	(457)
后记	(463)

一 政 务 篇
